第一章　军事生涯的起点

1. 从海外归来

1920年10月,年仅十六岁的邓小平(学名邓希贤),满怀‘工业救国’的热望,和八、九十位同学一起乘坐法国邮船‘鸯特莱蓬”号，远渡重洋，来到法国勤工俭学。到法国后的所见所闻，与他原来出国留学时的愿望相反，艰苦的生活环境使他不得不花大部分时间去打工。他先后当过克鲁梭钢铁厂的轧钢工、巴黎比扬古雷诺工厂的钳工和哈金森橡胶厂的雇员以及火车司炉、饭馆杂工，收入仅够糊口。后来邓小平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每天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仅有较短时间到巴耶中学、夏狄戎中学等学校读书。然而，就是在这种艰难而又紧张的环境中，他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道路。

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革命运动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广为传播。邓小平受赵世炎、周恩来等革命青年的影响，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各种政治宣传活动。1922年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三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成员之一。在此期间，他参与编辑了油印杂志《赤光》(原名叫《少年》,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的机关刊物),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以帮助在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学习理论，邓小平既当编辑，又当作者，还负责刻蜡纸和油印。因为他刻写的字迹端正有力、落落大方和设计的版面精巧美观、十分活跃，大家都亲切地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他为“油印博士”。1925 年，他受命出任里昂区党的特派员，负责领导该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

后来，由于法国当局对革命运动的破坏，旅欧各国的中国党团员有很多人分批离法转赴苏联学习。1926 年 1 月，邓小平从巴黎经柏林到莫斯科，先进东方大学，不久转到新办的中山大学读书。这是一所以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名字命名的大学，专为中国革命培养输送人才，全称是“孙逸仙劳动大学”，简称中山大学。在第一期六百多名学员中，既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邓小平与当时只有十五岁的蒋经国编在同一个班级，而且排队时两人时常站在一块，肩挨着肩。两人在中山大学同窗共读一年，关系十分密切。蒋经国时常称邓小平是“大哥”“学长”。邓小平回忆道，蒋经国在中山大学里“学习得不错”。邓小平在莫斯科读书近一年，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善于用所学的马列原理解释中国革命问题，一些独到见解，常常赢得同学们的称赞。

鉴于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和邓小平的实际表现，中共中央决定选调他和另外二十多名同志一起回国到要求共产党派人去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部队工作。1926 年底，他们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到乌金斯克换乘汽车，到达外蒙古的库伦（即乌兰巴托）。在库伦稍事休息，邓小平便同王崇云、朱世恒两人作为第一批先遣队，先乘苏联给冯玉祥部队运送弹药的汽车穿越茫茫蒙古草原，后改骑骆驼穿越西北大沙漠，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达了宁夏的银川。此后，他们三人又换骑马，日夜兼程，途经灵武、吴忠、同心、固原、平凉、经川、彬县、礼泉、咸阳，行程一千多公里，又历时一个多月，在 1927 年 3 月间到达西安城。在由银川前往西安的途中，邓小平一行经常向当地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在固原，他们住在马福祥的旧宅院（马福祥是马鸿逵的父亲，曾是冯玉祥部下的将领）。在彬县参观了传说是《西游记》中的“水帘洞”。沿途每隔几十公里就有一个冯部的驿站，他们凭介绍信，在驿站领取口粮和饲料，行李也由驿站派挑夫给挑。上路时还是穿着棉大衣或皮袄，到西安时，

当地居民都已穿上单衣了，而他们却仍然披着破旧的皮棉袄。

邓小平在 1982 年接见冯玉祥将军的亲属时回忆了从莫斯科到西安的经历 当时,我们从莫斯科一起来了二十多个人。刘伯坚同志也是那个时候到了西北军,做政治部长。“ 当时我们有三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我才二十三岁 ”。[1]

2.“ 西北黄埔 ”的政治教官

邓小平回国时，国共两党的首次合作已处于破裂的前夕，政局动荡。不久，他接受了党组织的委派，担任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的政治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的中共党组织书记。这是他革命军事生涯的第一站。

冯玉祥自 1926 年 8 月采纳李大钊建议的 “ 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 ” 的行动方针后，便结束在苏联的考察，回国率国民军由绥远出发，向陕北进军。五原誓师后，中共党员在国民联军（后改为西北军）总政治部和李大钊领导下，一面积极加强在各部队中的政治工作，一面大办军校培养军政骨干。中山军事学校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诞生的。

中山军事学校由国民党左派人物于右任和刘伯坚、史可轩等共产党人共同创办的，它与广州黄埔军校南北辉映，相互媲美，享有‘ 西北黄埔 ’、“ 第二黄埔 ”的美称。这所学校形式上隶属于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实际上是由共产党直接控制和领导的，校长是史可轩，副校长是由苏联回国的李林同志。邓小平在负责该校政治教育期间,开设有《社会主义概论》、《共产主义 ABC》、《国家与革命》及《新三民主义》等政治理论课程。他安排一些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进校，开展革命活动，还亲自给学员们讲授马列主义原理，宣传革命思想。中山军校培养出一批有革命理想和觉悟的初级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并向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选送了一批毕业生，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支由共产党直接掌握

的正规旅,即“许权中旅”。许权中旅长是一位共产党员,也是中山军校总队长。该旅为后来共产党发动陕西渭华武装暴动奠定了组织基础。

在中山军校的影响和带动下,西北很快出现了一个“军校群”。国民军在五原、包头、兰州、银川、西安等城镇,先后办起了步兵、炮兵、骑兵、军械、军医、航空等十六所军事学校和军官教导团,招收初级军官、青年学生和有文化的士兵,经过军校培养训练,为西北国民军各部队输送骨干。此外,在西安还开办了以中共党员刘念初为院长的中山学院,邓小平、刘伯坚、许权中等共产党人,经常应邀来校讲课或作报告。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革命人士、共产党人和工会干部。接着,又指使湖南、湖北的反动军官制造了“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会,捕杀中共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及工农群众。不久,在南京建立起了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中央政府,并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封锁包围设在武汉的国民政府,致使国民革命进入到危急关头。这年6月间,冯玉祥参加了汪精卫在郑州召开的反共会议,随后便责令所有在他部队工作的中共党员到河南开封集中,名曰训练,实质是“礼送出境”。邓小平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于6月底离开西安,经郑州,很快到达了武汉。

邓小平在武汉向中央军委报到后,旋即将党的组织关系转到党中央,并被分配担任中央秘书工作。不久,国民政府的政治首领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公开与蒋介石联合反共,致使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摧残,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为适应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他把原名邓希贤改称邓小平。

1927年8月7日,邓小平在汉口列席了由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这次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战略决策,同时决定派遣有经验的干部到一些省区去组织领导农民暴动。几十年后,邓小平在

1980年参观‘八七会议’会址时回忆说：“李维汉是秘书长，会议代表有二十几个人，我是中央秘书，陈独秀原先要搞正规大中央、搞八大秘书，我就算是一个。以后没有到齐，我是政治秘书，还有刘伯坚没到任。1927年底在上海我才当秘书长。我们二十几个人分三批进来，我是第一批，记不清和谁一起进来。我在这里呆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极为紧张。我是最后走的，走的最晚。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的当时甚至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是一个晚上带小行李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

“八七会议”后，为了避开武汉的险恶环境和适应革命斗争形势需要，邓小平随同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往上海。1927年12月，二十四岁的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财务、交通等工作。在极其严酷的环境中，他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具体任务，受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称赞。

注 释

[1] 刘金田主编《邓小平的历程》（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47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二章　燃起武装暴动之火

1. 奔赴广西

1927 年大革命惨遭失败后，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当时的广西形势也同其他地方一样，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中共党组织由公开合法的地位转入秘密状态，幸存的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农村开展地下活动。为了挽救革命，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站立起来，决定对蒋介石的血腥屠杀实行武装抵抗。1927 年 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从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军队的序幕。继南昌起义后，又先后发动了以农民为主的秋收起义和以工人为主的广州起义。上述起义均遭受挫折或失败，其中秋收起义部队由毛泽东率领，沿罗霄山脉南下，向反动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进军，不久创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广西，共产党没有掌握一兵一枪，只有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民仍在坚持公开的斗争。为恢复广西地区的党组织和加强领导力量，中共广东省委派参加过广州起义的雷经天到广西工作。广西的党组织活动虽然得到恢复，但由于广西白色恐怖严重，穷乡僻壤，又缺乏干部和经费，革命工作始终未能打开局面，广西革命仍处于低潮。

1928年 3 月,蒋介石政府为控制两湖(湖南、湖北)地盘,派重兵攻打武汉，与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展开了激烈角逐，同时联络西北冯玉祥、山西阎锡山和四川刘湘等，对武汉

进行围攻，还策划拉拢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校长俞作柏和桂系第四集团军师长李明瑞，以分化瓦解桂系。俞、李是姑表兄弟，关系密切。俞作柏曾被桂系军阀政府通缉并查封过财产，一度还落难香港。他俩十分不满李宗仁、白崇禧排除异己的作法，所以决定利用蒋桂混战之机倒戈。这年 6 月间，桂系军阀战败，李、白二人被迫逃往香港，而俞、李二人因在蒋桂战争中倒桂有功，被蒋介石派回广西主政。俞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任广西绥靖司令。俞、李执政后深感广西内部政治派系混杂，各种势力明争暗斗，为防止桂系东山再起和蒋介石插手控制广西，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并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到他们的军政机关工作。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也想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广西动员组织群众，创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准备武装起义。中共中央根据当时担任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的推荐，决定派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广西开展统战、兵运和农运工作。张云逸、贺昌、陈豪人、叶季壮、龚鹤村、徐冠英、袁任远、李谦等也先后被派往广西，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这是邓小平独立担负一个战略区领导重任的开始。

1929 年 7 月，邓小平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派遣，在龚饮冰陪同下，从上海经越南先到香港，在香港会晤了俞作柏、李明瑞，还听取了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介绍的情况，然后秘密前往南宁。9 月间到达南宁后，邓小平化名邓斌，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

在南宁，邓小平通过中共党员俞作豫的特殊社会关系（俞作豫是俞作柏的胞弟、李明瑞的表弟）了解俞、李政权的情况，通过中共广西特委书记雷经天了解广西的革命形势，最后认为俞、李是中共过去的朋友，他俩要想在广西站稳脚跟，图谋生存，也必须借助于中共所领导的广西工农力量。于是，决定采取与俞、李合作，稳定广西局势，孤立亲蒋派和改组派势力，集中打击桂系军阀顽固势力，并借机发展革命力量，准备武装暴动的策略方针。为此，邓小平亲自做俞、李等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巧妙而妥善地把中

央和广东省委派来的几十名党员干部安插到广西省军政部门任职。陈豪人到省政府担任机要秘书，张云逸出任广西教导总队副队长，龚鹤村委以南宁市公安局局长之职，徐冠英担任广西编遣特派员办事处总务科长，陈可福出任俞作柏的秘书。此外，俞、李还同意释放被桂系军阀监禁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并任命其中一些人到左右江各县当县长。

鉴于俞、李有扩充军事力量，请中共派人帮助其改造旧军队的愿望，邓小平便建议并帮助他们开办以培训初级军官为目标的教导总队，还从广东、广西选调一百多名工人、学生党员到教导总队各连队当干部或学员。对成份繁杂、军纪败坏的广西警备军六个大队进行认真整顿，争取俞、李任命共产党员张云逸、李谦担任警备第四大队正副大队长，俞作豫、史遽然任第五大队正副大队长。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张云逸、俞作豫等利用合法地位，在部队建立秘密党支部，加强士兵的思想教育工作，分化和改造旧军官，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党员，增加各连队的工农比例。对政治上反动的军官,则采取‘ 调虎离山 ’和‘ 明升暗降 ’的办法,名义上给他们较高的职位，但实际上则剥夺他们的指挥实权。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教导总队、警备第四和第五大队已面貌一新，由此建立起中共在上述三支部队中的领导地位和群众基础。

为了发展革命力量，加强中共对工农运动的领导，邓小平等耐心说服俞、李实行民主，支持工农运动，促使他们在政治上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发展革命势力的措施。诸如，通令开放工农运动，确认各地工会、农民协会组织的合法地位，选派一些青年和农运干部以“ 二五减租 ”为号召到各县工作。随着广西各地农民运动的兴起，在邓小平的建议下，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于 1929 年 8 月上旬在南宁公开举行，会议选举成立了以雷经天为主任委员、韦拔群为副主任委员的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农民代表会期间，邓小平指示中共广西特委争取俞作柏同意以组建“ 右江护商大队 ”的名义，由省府拨给东兰、凤山地区农民武装革命军一批武器弹药，

还要求广西军委抽出干部协助韦拔群在南宁组训农军。会后，又让广西特委推荐一批党员和进步人士并经俞作柏同意成立“左江农运委员会”。

邓小平在抓紧统战、兵运和农运工作的同时，秘密向广西特委传达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研究部署广西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为宣传贯彻中共“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邓小平与中共广东省委代表贺昌指导广西特委，于 1929 年 9 月中旬在南宁市郊秘密召开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认真总结了中共在广西的斗争经验，确定了推动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的任务和策略，明确提出要深入发动群众，扩大工农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准备武装暴动，创建红色苏区。这对后来举行左右江起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至 10 月间，广西全省已健全的县委和县特支有九个，党员共计四百二十多人，仅南宁一地的党支部就有十个，有组织的农民协会会员达三十五万人。广西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当时逃居香港的新桂系军阀头目李宗仁惊恐万状，哀叹道：俞作柏、李明瑞南归后，为虎附翼，共祸始炽，桂省几成为共产党之西南根据地。

2.“南宁兵变”

正当广西革命斗争形势出现转机的时候，广西政局发生了突变。国民党改组派头目汪精卫派薛岳到广西南宁游说，策动俞作柏、李明瑞与广东军阀张发奎联合反蒋，加上当时蒋介石不满俞、李与中共的合作关系，以各种手段钳制俞、李，因此俞、李二人决定倒戈反蒋，出兵攻打亲蒋粤军陈济棠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内部有人主张随俞、李出兵广东，进攻陈济棠；有人主张把部队拉到梧州、桂平和柳州方向；还有人主张立即在南宁举行武装暴动。邓小平则认为，俞、李主桂不到半年，立足未稳，兵力只有三个师，内部又不一致，仓促反蒋，必遭失败，这也将打乱中共在广西的原定

计划。因此,邓小平果断决策,继续同俞、李合作,但不能跟随他们去攻打陈济棠部，也不能把部队开到有敌人重兵把守的梧州、柳州等大城市，更不能过早地在南宁举兵，而应随机应变，做好向左右江地区农村进军的准备。为此，邓小平一方面亲自向俞、李陈述利弊，劝说他们不要出兵参与军阀混战；另一方面，指示为中共所掌握的部队采取必要措施，以应付兵变后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使部队可以随时撤离南宁，到左右江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雷经天到恩隆县平马镇组建省农民协会右江办事处和担任中共右江特支委书记；严敏、钟鼎、陈洪涛、徐达生等分别到东兰、凤山、恩隆、奉议等县筹建县委和领导农运;何建南、麦锦汉、苏松甲、苏文灿等到龙州县领导工农运动；韦拔群率农军营返回东兰；龚饮冰到上海向中央汇报有关情况。

俞、李不顾蒋介石的威胁，不听邓小平的劝告，于 1929 年 9 月下旬宣布通电反蒋。10 月 1 日,在南宁召开讨蒋誓师大会,宣布俞作柏为讨蒋南路总司令，李明瑞为副司令，随后出师沿西江进攻广东。邓小平预感事态有可能急转直下，便以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尚未训练好和需要保卫后方为由，把中共所掌握的三支队伍留在了南宁。俞、李还同意由张云逸兼任南宁警备司令和接管南宁军械库等要地。

不出邓小平所料,俞、李出兵反蒋不到十天,讨伐部队还未出广西,其部属吕焕炎(第十五师师长)、黄权(第十五师第四十四旅旅长)和杨腾辉(第五十七师师长)都被蒋介石以重金高禄收买，倒戈通电拥蒋。蒋介石乘机利用这一变化，又起用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叫他们共同收拾广西的局面。拥蒋粤军头目陈济棠率三个师兵力入桂逼近南宁。俞、李讨蒋失败的消息传到南宁,顿时人心骚动，反革命势力抬头。在这一紧要关头，邓小平当机立断，按原计划把部队拉出南宁，分别沿陆路或水路向左右江地区开进。随后，又把南宁军械库中存放的五六千支步枪和大批弹药装上事先准备好的十多艘汽船和民船。10月中旬,邓小平率领机关干部

和警卫人员，随军械船溯右江而上，驶往百色。从此，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广西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南宁兵变”失败后，俞、李率残部逃回南宁，又在警备第五大队的护送下撤往左江地区的龙州。俞作柏到龙州后取道越南出走香港，李明瑞则因法国领事馆不发给护照，而留在第五大队安身。

1929年11月中旬，李明瑞由龙州来到右江地区的百色，准备利用粤桂军阀混战桂平、贵县一带，南宁守敌空虚之机，派警备第四、第五大队会攻南宁。后因第五大队副队长蒙志仁叛变，计划落空。当时，李明瑞陷入极度苦闷和矛盾之中。邓小平、张云逸针对李明瑞想利用龙州的地理条件，伺机集结旧部，与李宗仁等再作较量的思想实际，多次找他谈话，明确指出他这样做是不可取的，告诉他共产党不仅主张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还要依靠广大工农群众搞土地革命，组建红军，在左右江建立根据地，真诚希望他参加革命。在思想上，好言开导，安慰鼓励；在生活上，给予关照，派一个连的兵力“保护”他；在政治上，给予信任，郑重许诺日后成立红七、红八军时，请他担任两军总指挥。由于邓小平、张云逸的耐心工作和以诚相待，表示了中共广西特委对李明瑞的高度信任和真诚希望，从而使他明瞭大义，一改故辙，拒绝蒋桂军阀等多方的威逼利诱，毅然决定投身工农革命。他表示，“我投奔共产党，心已定，愿已足，今生别无他求，唯矢志共产主义事业”。

不久，李明瑞受命返回左江，与俞作豫等积极筹备龙州起义。李明瑞坚决执行中共广西特委的决定，扩编警备第五大队，让共产党员宛旦平、潘兆昌等到部队中担任要职，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共产党对部队的控制。12月中旬，邓小平、严敏等到龙州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广西特委关于举行龙州起义和成立红八军的决定，并与李明瑞一起共商起义前后的工作计划。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举行，红八军成立，李明瑞担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在邓小平的引导和革命环境的熏陶下，李明瑞努力工作，要求进步，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士，最后为左右江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

李明瑞的转变和成长，是邓小平坚持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统战政策的结果。当时，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由于受党内在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左”倾情绪的影响，认为在上层军官中进行工作是搞军事投机，把俞、李当作国民党改组派，批评邓小平对李明瑞的争取教育是‘幻想’,主张‘以群众的力量赶跑他’,更不同意李明瑞参加武装起义。邓小平则认为，李明瑞虽有旧军人的一些劣根性，但他与蒋介石、李宗仁等军阀的矛盾，中共却可以利用。在“南宁兵变”失败后,应利用他在旧军队中的威望,努力争取、教育他及其部属，以便进一步分化敌人，壮大革命力量。周恩来在 1944 年撰写的《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一文中充分肯定了邓小平争取李明瑞参加革命的宝贵经验,写道：‘‘六大’认为在官长中进行工作就是军事投机。后来的事实证明，敌军大部队的哗变和投降红军，都是由于我们在军官中进行了工作。如广西李明瑞的一个师变为红军，江西第二十六路军的起义，都是由军官领导的。”[1]

作为李明瑞参加革命最重要的引路人，邓小平在 1986 年春途经广西时还与当地领导同志谈起过这段往事，他说：“我同李明瑞第一次见面是从百色到龙州的路上，李明瑞入党是我到上海请中央批准的，我们两人一路走向江西。李明瑞是红七、红八军的总指挥，我是总政委，苏维埃主席是雷经天。八军被打垮了，七军能打。俞作柏跑到香港去了,李明瑞是坚决的!’他还要求‘多多宣传李明瑞’,并在李明瑞的故乡题写了‘明瑞中学’校匾。针对有人对大百科军事卷《李明瑞》条目释文称李明瑞是“左右江起义领导人之一”存有异议，邓小平于 1986 年 5 月 22 日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百科编审室的请示信上批示：‘称李为‘左右江领导人之一’的提法,是正确的”。

3. 揭竿亮旗

“南宁兵变”后，邓小平等为什么选择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

左右江地区,位于广西西南部边陲。右江地区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包括右江流域和红水河流域的东兰、凤山、凌云、奉议、恩隆、思林、果德、向都、河池、隆安等十多个县,聚居着壮、汉、瑶、苗、彝、回、仫佬、毛难等民族,其中壮族人口占四分之三。这些民族由于深受帝国主义和土豪劣绅的残酷压榨，以及军阀的巧取豪夺，加上连年兵灾匪祸，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有着勇于抗争的精神。早在 1921 年，壮族青年韦拔群便开始在东兰、凤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曾指挥农军三次攻打东兰县城，赶走了县知事和团总。随后，又仿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做法，在东兰县举办过三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宣传革命思想，启发群众觉悟，为右江地区培训农民运动骨干。在韦拔群的带动和影响下，余少杰、黄治峰、黄书祥等人也在恩隆、奉议、思林等地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右江地区的农民武装斗争也没有停止过，还曾攻占了果德、向都、那马、思林等四个县城。这里的广大群众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革命觉悟比较高。这一地区虽然偏僻、闭塞，经济文化落后，但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较薄弱，没有正规军，只有一些民团和土匪武装。另外，群山环抱、山高林密、地势险要的地理环境，对开展游击战争十分有利，上山能藏,下山能打,进退回旋余地较大。邓小平回忆说：“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2]

与右江地区毗邻的左江地区,包括左江流域的龙州、上金、雷

平、思乐、凭祥、宁明、扶南等十多个县，南靠十万大山，西部和西南与越南接壤，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曾被称为“蛮烟瘴雨”之地。龙州是广西西南边陲的重镇，也是左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 1885 年中法战争后被开辟为帝国主义的商埠。这里虽然反动统治的基础比较深厚，但以壮族为主的各族人民却有着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传统。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左江各族群众参加与支持过刘永福领导黑旗军的抗法作战；1907 年，凭祥等县人民积极响应孙中山在镇南举行的起义；二十年代初，高孤雁等壮族进步青年在龙州宣传革命思想；大革命时期，陈霁、易挽澜等共产党人成立‘镇南道农民协会办事处’，领导农民运动。

1929 年 10 月 20 日，邓小平和张云逸率部队到达右江地区的恩隆县平马镇后，立即召开了党委会议，明确提出中共广西特委在左右江地区的当务之急，就是领导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做好筹划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成立苏维埃政府的准备工作。10 月 22 日，部队分别进驻百色县城、奉议县田州镇和那坡镇一带。在百色，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共广西特委和军委联席会议，就武装农民、发动起义、创建根据地、改组部队等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综合群议，邓小平作出如下决定和部署：

“(一)积极发动群众斗争，充分武装农民，组织工会、农会，建立地方党部；

“(二)改造第四大队，逐渐撤换反动军官，加强士兵工作，改造士兵成分（增加大批农民入军队中）；

“(三)号召群众并以军队力量协同群众扑灭豪绅武装；

“(四)解决第三大队，围缴其枪械；

“(五)扩充新的部队，培养新的干部”。[3]

会后，邓小平、张云逸等立即着手解决听命于桂系军阀的反动警备第三大队。当时，右江地区的土豪劣绅一面纠集反动民团，占领要点，妄图负隅顽抗，一面同熊镐任大队长的警备第三大队暗中勾结，妄图消灭警备第四大队，镇压工农运动。

一天，奉议县农民截获到桂系军阀头目黄绍竑发给熊镐的“先发制人”密件，邓小平闻讯后马上下达准备作战的命令。经过事先周密部署，于 10 月 28 日指挥第四大队和恩隆、奉议、思林等数县农军同时行动，经两天两夜激战，将驻扎在百色、平马、田州、那坡等地的第三大队围歼缴械，共歼敌一千多人，缴枪三百多支。

接着，邓小平、张云逸对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进行全面整顿。在政治方面，成立第四大队政治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指示负责宣传工作的袁任远筹备出版《右江日报》，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纲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的种种罪行，以加强对官兵的思想教育，提高广大士兵群众的革命觉悟。在组织方面，以“调训”等方式撤换反动军官，清除兵痞流氓，从教导总队中选调一些进步学员补充担任营连干部，招收上千名农民充实部队，开办新的教导队和训练场所。与此同时，健全部队中的党组织，积极发展党员。在军事方面，加强军事训练，帮助农民进行反对地主豪绅和土匪民团武装的斗争。

邓小平在着手改组部队的同时，还特别重视发动群众，武装农民。部队到达右江后不久，他就指示把随船运来的五六千支步枪，大部分给东兰、凤山、奉议、恩隆、向都、果德等县农民协会，以组织武装农民。经整顿后的第四大队，按连排建制派往各县，发动群众，打土豪，收缴反动武装，还打开地主的粮仓，分粮给城镇居民、工人和广大贫苦农民。随着以打击地主豪绅为中心内容的革命运动的掀起，右江地区各族人民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阶级觉悟逐步提高，青年人纷纷报名参军。

曾任红军七军副官的许凤祥回忆说：在百色，我在小平同志身边工作。当时，我们不断接到派往各地的同志给“邓秘书”的信函、电文，反映旧政权的残酷压迫和土豪劣绅的胡作非为，以及人民群众对我军的热烈欢迎。每当我把这些信函、电文送给邓小平同志时，小平同志都很重视这些由各地传回的消息。为了准备起义，小平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白天找同志谈话、开会，布置工作。晚上

则与张云逸等首长在一起商讨大计、运筹起义事宜。不久，我军就消灭了反动的警备第三大队，进一步发动工农群众，继续整顿改造部队。

11 月初，由邓小平派去上海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的龚饮冰回到百色，带回来了中央关于批准举行左右江武装起义的计划和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广西前敌委员会的决定。中央颁给右江起义部队的番号为“中国红军第七军”，左江起义部队的番号为“中国红军第八军”。

接到中共中央及广东省委的指示后，邓小平立即在百色城中的粤东会馆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传达中央批示精神，并对百色起义作出详细计划：

首先“决定于最短时间内以极紧张的精神，使工作上略为布置就绪，即行动作。……于 12 月 11 日伟大的广州暴动纪念日发动整个的转变计划。”

其次，宣布取消二十三种苛捐杂税，利用《右江日报》“公开提出拥护苏区，反对军阀混战，拥护红军，反对国民党种种宣传”。

第三，进一步肃清第四大队中的反动军官，并把部队集中于“百色、平马二地，待期举行转变”。

第四，“成立新教导队，开办军事政治训练所，招集右江一带革命青年加以军事、政治之训练”，培养部队骨干。

第五，秘密印刷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施政纲领的小册子、标语、传单。

第六“向商人筹得十数万现款”。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电召邓小平到上海汇报工作。为进一步做好左江起义的准备工作，邓小平决定先到龙州，然后再赴上海。在龙州，他主持召开了党政军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关于举行武装起义和成立红八军的决定，并向俞作豫、李明瑞介绍右江改造第四大队的经验，明确提出要着重抓紧对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的整顿，争取在短时间内胜利发动龙州起义。他还指示把原来的《群众

报》改名为《工农日报》,增办《右江红旗》刊物,大力宣传革命真理,启发教育广大官兵。在起义工作布置基本就绪后，邓小平化装成商人，经香港和越南前往上海。

1929 年 12 月 11 日，由中共广西前委掌握的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近三千人在百色举行武装起义，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军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纵队。同日，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在平马镇隆重召开，选举成立了以雷经天为主席的右江苏维埃政府。

这一天，山城百色到处充满着节日的气氛，鞭炮齐鸣，红旗飘扬，张灯结彩。工人、农民高举大刀长茅，敲锣打鼓走上街头；红七军的干部战士个个都穿上了新发的灰色军装，帽上别着红五角星,颈上系着红领带,威武、整齐地集合在军旗下庄严宣誓;市民、学生、妇女、儿童们穿红着绿，不停地挥动他们手中的小红旗；街道上贴满了庆祝起义胜利的标语和红七军的布告。

继百色起义后，按照邓小平和前委的部署，警备第五大队和左江工农赤卫军三千多人，于 1930 年 2 月 1 日在龙州举行武装起义，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军事委员会，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政治委员，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王逸担任左江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古城龙州沉浸在万民欢呼声中。

2 月 7 日,邓小平从上海回到龙州。在龙州,他传达了中央有关指示，分析了左江地区的斗争形势，建立了红八军临时前委，指示红八军迅速向右江靠拢，与红七军汇合。为了赶回右江地区传达中央指示，邓小平于 2 月下旬，离开龙州，途经雷平县城宝圩时，指导正在那里休整的红八军第一纵队组建党委会，并在党员干部会议上强调指出：纵队党委是部队最高领导机构，纵队一切重大事情都要经党委会讨论决定后才能执行。然后，他随同第一纵队向靖西县城进发。在行军途中，邓小平对第一纵队从政治到军事上都作了许多指示，在强调红军要加强宣传工作时说：我们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